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美]詹姆斯·坎农著

(供内部参考)

33

00048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一个参加者的报告

〔美〕詹姆斯·坎农著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James P. Canno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AMERICAN COMMUNISM**

Lyle Stuart, publisher

New York

1962

(供内部参考)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一个参加者的报告

[美] 詹姆斯·坎农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明庄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 11017·210

1963年12月初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48开 11¹⁰/₁₆

开本 860×1168 1/32

字数 268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10) 1.70元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是美国老牌托洛茨基分子詹姆斯·坎农。他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主要成员之一，曾于1922年赴莫斯科会见托洛茨基，后即成为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1928年他因在美国共产党党内进行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4年他就在托洛茨基本人的鼓励和支持之下，糾合了美国的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创办了《新国际》月刊（它是所謂第四国际成立以前在美国出版的最早的托派理論刊物，1940年改名为《第四国际》，1956年坎农集团同第四国际分裂后，又改名为《国际社会主义評論》），大力鼓吹成立第四国际，并于1938年創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至今坎农仍任該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56年以坎农为首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同第四国际的巴布洛集团意見分歧，而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今年6月，在第四国际召开的所謂“重新統一代表大会”上，坎农集团已宣布同巴布洛集团重新合作。

本書主要是由作者写給西奥多·德萊柏的一些信輯成的。德萊柏是曾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叛徒，后来成为美国統治階級的御用文人；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資助下，曾撰写《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一書，于1957年出版。当时，为了搜集資料，德萊柏曾去信請求坎农合作，回答他所提出的一些有关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活动方面的問題。坎农的复信和本書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后来大多已在美国出版的《第四国际》及《国际社会主义評論》两杂志上发表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1962年又将这些东

西加上德萊柏写的引言編輯出版，显然別有用心。在国际上出现了反“斯大林主义”的逆流，現代修正主义分子大肆活动的时候，被历史丢弃到垃圾箱中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誤認為时机已到，又都蠢动起来。坎农这个老牌托派分子也来搖旗呐喊，妄想为托洛茨基翻案，也为他自己翻案。在本書中他說：“美共领导人过去用斯大林伪造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来填充好几代青年黨員的头脑，他們現在假惺惺地承認斯大林的‘錯誤’——在俄国；但是，对于他們自己伪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錯誤’，他們却一字不提。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和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一样是歪曲的。”于是，他就来顛倒黑白，大做翻案文章了。并且，尽管他不得不承認德萊柏的反共立場，例如他說，“不幸的是，……德萊柏在最后擺脫斯大林主义后並沒有能改正他原先的錯誤——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当做是同一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对叛徒德萊柏的反动透頂的《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一書大为捧場。他認為，“相反地，德萊柏的著作則是一部具有誠实学者风度的真正卓越的著作。对于一切希望知道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何处来以及其開創时期情况的認真的研究者來說，這本書肯定会成为主要資料来源。德萊柏不費吹灰之力就把福斯特的別有用心的伪造‘历史’打落到廢紙簍里去了。”由此均可看出作者居心何在了。但是，對我們說來，本書无异是一份供状，可以从中看出美共早期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个人主义野心家、叛徒，是如何向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猖狂进攻，并最后走向可耻的失敗的，以及現代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美国修正主义分子与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的淵源关系。

为便于排校起見，本書索引所用頁碼为原書頁碼，查用时請

以排在頁边的原書頁碼为准。

本書譯者为张鼎五同志。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63 年 11 月

目 录

序 言 西奥多·德萊柏·····	5
志 謝 ·····	10
緒 言 ·····	13
第一編 給一位历史学家的信 ·····	33
我的論点·····	33
考察早期共产党的四种方法·····	37
头几年——在地下的党·····	39
弗雷納——創建人·····	45
早期的領導·····	50
关于劳工党的政策的起源·····	57
再談談劳工党政策·····	61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美国問題”·····	64
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領導的改組·····	75
佩帕尔的領導·····	80
佩帕尔領導的傾复·····	87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瑣記·····	99
战前的社会党 ·····	100
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者 ·····	102
战前的左翼 ·····	10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福斯特 ·····	111
福斯特和白劳德 ·····	114
洛夫斯东和毕特尔曼 ·····	122
福斯特——坎农集团 ·····	124

白劳德的作用	134
共产国际的五届四中全会——1924年	136
1924年的选举以后	137
1925年：“平衡委员会”和“莫斯科来的电报”	140
二十年代的“党的生活”	147
巴塞克罢工	149
1925-1928年派系斗争中的占压倒地位的问题	154
1925年以后：永久性的派系斗争	157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	171
1927年：从鲁登堡到洛夫斯东	178
1927年的若干遗留轶事	188
洛夫斯东的领导	196
关于季诺维也夫的一点想法	199
党内六七人	20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	209
洛夫斯东在莫斯科碰到的麻烦	216
斯大林的迂回的阴谋	217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220
关于批评者和批评	232
“第三时期”	233
福斯特的最后挣扎	234
福斯特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	235
斯佩克特的作用	236
我们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	238
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	241
黑人问题	244
第二編 俄国革命和美国黑人运动	247
第三編 先驱者	261

尤金·德布斯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261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伟大的序幕	293
第四編 西奥多·德莱柏历史著作評介	327
一《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	327
二《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	340
索 引	349



序 言

9

西奥多·德莱柏

許多年以前——現在看来是許多年以前了，当我第一次想到同詹姆·坎农^①联系，要求他对于写一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初稿給与合作的时候，对于他是否会同意，我是不抱很高希望的。我当时可以想到好几个理由，說明他为什么可能对这个主意不怎么热心。我从来没有見到过他，我覺得他没有理由信任我。我还把我无论如何要請他合作的打算，試探性地告訴了一些也認識詹姆的我的友人，他們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相信，他决不会願意同我有任何来往。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試一試。如果他拒絕，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責任。詹姆斯·P.坎农来了回信；这封信滿足了我的要求而有余。但是，在我把第一批問題寄給他和得到他的答复之前，我仍然沒有把握。我花了好几天功夫准备第一批的問題。这里，讀者可能对于这部历史著作的“方法学”感到兴趣。

按照传统的方法，历史学家并不“創造”史料；他的材料是已存在于某种具体形式中的。他寻找文件、回忆录、信件等等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当代历史这个题目是不能用传统的方法来处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來說尤其是如此。（有些历史学家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关于記述 1789 年以后的事件的一切著作，真正的純洁派似乎要以文艺复兴为分界綫。）共产党的文件往往特別

^① 詹姆，是詹姆斯的昵称。——譯者

10 曖昧，常常是你怎么解释都通。但是，主要的是，各种各样传统的历史材料——以传记、自传、信件、日记等形式出现的个人回忆和解释，几乎完全阙如。可以肯定，这些材料是有一些的，但是你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只有在同共产主义运动**无关**的时候才是有意思和有内容的。例如，查尔斯·E.鲁登堡的正式传记正好在他成为共产党领袖时结束。许多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大多数写回忆录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要说明作者为什么决定同共产主义运动决裂，而不是要说明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干了一些什么。

因此，从事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他希望在他的作品中利用领导人物的回忆录，他就应该出去找它们。历史学家不能消极地等待这种材料送上门来；他必须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创造这种材料。就我来说，这样一个角色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早期领导人物中已有很多人脱了党——有些人在许多年以前就脱了党，他们不再有必要在忠诚和纪律的基础上回答我的问题。此外，他们不论在当时或现在都代表不同的意见，因此，我写的东西不可能使他们全都感到满意，或者说，使他们任何一个人感到满意。时间在飞逝，我决定试一试，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抱乐观态度。而且我也深切地意识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中可能遇到的危险。

这些事件是在三十多年以前发生的。时间的消逝，记忆的衰退，再加上人都愿意为自己辩护，这一切都是明显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否能够避免？我想答案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但是在过去的文件中也是没有什么绝对的保证的。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总是求助于所谓“直接接触”，不是用它来代替文献来源，

而是作为后者的补充。文献仍有它固有的确实可靠性，而且占优先地位——只要它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的确，只有掌握可以弄到手的文件，訪問或者通信才可能有良好結果。历史学家¹¹如果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件仅仅問一句“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定会失望的，而且甚至更糟糕——会受騙的。这项工作要困难和复杂得多。

在我还根本没有給詹姆·坎农写信以前，我已設法从可以弄到手的材料中尽可能了解他和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这么做有好几个理由。我只想向他提出一些我用任何其他方法不能得到解答的問題。我也希望在提出問題时表明我已經知道了多少情况。因此，我在准备提出每一个問題之前，先要弄清产生这个問題的背景。这就必然使得我发出的信很容易同我收到的信一样长，一样詳尽。这些信，有时我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写成，但是这样不嫌麻煩是很值得的。为此，我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組織現有的材料，在我的思想中弄清楚我到底希望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对方來說，这些信刺激了記憶，使他重新想起往事。而且这些信也暗示，任何答复必須同一批公認的事实和文献証据相一致。

至于詹姆·坎农，我一直到我們通訊很久以后才見到他本人。我願意这样；我們相隔两地并且沒有个人来往，这就使得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反之，就可能在同样程度上缺乏这种客觀性。起初，他的信同任何人在答复一个陌生人的詢問时可能写的信沒有两样。但是不久我就注意到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变化。这些信变得比較正式了，組織得更好了，每封信都各具特色，深为可貴。过了一个时候，我感到詹姆已經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写自传的阶段——这是我們从一个美国共产主

义运动老前輩那里所能得到的第一部自传，也許也是唯一的一部自传。美国共产党的官方人物也出版过所謂自传，但是这些自传大半是假的。坎农的信却是真實的东西。我認为研究一般美国工人运动的人，特别是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在今后好多年中一定会珍視这些信件。

- 12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随着时间的消逝，恩怨俱泯，昔日的仇人也就不再互相斗争，而是要互相了解。一个人在回顧他漫长的一生中可能是最丰富也是最痛苦的岁月的时候，他就会以一种以前也許是不可能的悲天憫人的心腸和公平态度回想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我不知道坎农的其他著作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是我相信這本書是經得起的。它摆脱了党同伐异和个人恩怨的偏見和情緒。这是一部“过去事情的回忆”，很可能是作者献給他曾为之貢獻了一生心血的运动的最好礼物。

我可以作証，他的記憶力非常清晰。有一件事在我的脑中特別突出。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有关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詹姆·坎农。两个人都把他們所記得的情况告訴了我，但是总是对不上头。我接到詹姆关于这件事的信后，就又去見另一个人，把詹姆的記述讀給他听，而沒有告訴他来源。我讀完后，他点点头說道：“对了，我想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一定弄錯了。”类似的情况有好几次，事实証明詹姆都是正确的，我从这种屢試不爽的經驗中得出結論，他的記憶力大大超过了与我有同样来往的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詹姆·坎农对二十年代的事件的記憶会比所有其他的人清楚得多。仅仅是因为某种天赋的心理特点嗎？重讀这些信件后，我終於得出这样的結論：这还是因为某种其他的原因。和与他同輩的其他共产党領袖不同，詹

姆·坎农**要想記住**这段生活。他的这部分生活对他來說仍是活的,因为他沒有在自己的心中扼杀这部分生活,我很高兴我也出了一些力来帮助他把这部分生活重新展現在人們面前。

西奥多·德萊柏

紐 約

1961年2月3日

志 謝

這部關於美國共產主義運動頭十年的書，從它的副題可以看出，是一個參加者根據記憶所寫的証辭。最初，我並沒有寫這些詳盡的回忆和評論的打算。這些東西是在別人的促動下寫出來的。

1954年2月，我接到西奧多·德萊柏的一封信，說他正在從事一部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著作，希望同一些初期運動的參加者核對一下他的研究結果。他問我是否願意“討論一些問題，瀏覽一些材料”，這些問題和材料是同頭十年有關的。我當時正在從事其他工作，不過我想答复一些問題不是什麼難事，我就貿然同意了他的要求。

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這件事情將怎樣結束，我當初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因為我大大地低估了這位歷史學家對待工作的嚴肅態度，和他那尋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他在巨細無遺的研究過程中挖掘出不少材料，也遇到不少屬於解釋方面的問題，他就根據這些材料和問題，堅持不渝地向一切可能的方面去了解情況和征詢意見。

德萊柏的第一批問題要求答复的詳盡程度，大大出於我當初的意料。因此我的第一批答复引起他提出一系列新的問題。而這僅僅是開始而已。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在1957年出版以前的三年期間，我們在事實和看法方面提出和答复了更多的問題，其中還穿插着好幾次訪問。在1957年
14 后恢復了問答通信，這樣又繼續了三年，一直到他的第二部著作

《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在 1960 年出版。

在德萊柏的坚持不断的鞭策一样的詢問下，我不得不逐步作了一部相当完全的纪录，記下我作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回忆、我对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的看法和我对我的記憶中的有关人士的看法；甚至写下了一份我也参加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激进运动的扼要报告。

本書大部分材料——《第一編：給一位历史学家的信》——是为了回答德萊柏提出的問題而写給他的信。所有其他部分，包括《緒言》，都是以自成首尾的文章形式叙述專門問題，都是同德萊柏通信的副产品，多多少少都受到通信的直接启发。

我認为，我們的六年通信是忠实合作的很好的榜样，双方尽管有根本性的意見和看法分歧，却仍然要努力弄清楚事实。《第四編：西奧多·德萊柏历史著作評介》是我對我們意見一致和不一致之点的看法。

我特別感謝三位同志——詹妮·摩根、呂芭·汉森和朱莉婭·侯德克。她們担任了全部打字和其他有关的技术工作，因为她们相信这有利于事业；我也感謝罗斯·卡尔斯納，她曾經经历了过去日子的艰苦斗争，然后在我回忆和报告这些斗争的时候，又同我一起再次经历了这些斗争。

这一文集的大部分材料原載《第四国际》杂志及其前身《国际社会主义評論》。

J. P. C.

洛杉磯

1961 年 12 月 1 日